

《文心雕龙》唐宋元版本价值略说

林 其 铤

《文心雕龙》最早见录于唐贞观十年（636年）成书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同年成书的《梁书》刘勰本传。尔后新旧《唐书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以及郑樵《通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等公私书目均有著录。成书于日本宽平年代（相当于我国唐昭宗之世）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杂家类亦有著录。今存的最早写本为敦煌遗书《文心雕龙》残卷，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正年间嘉兴郡学刊本。宋刻本久已亡佚，但今存南宋刻《太平御览》，内有大量引文，大体可窥宋槧面目。本文拟就唐写本、宋本《太平御览》引和元至正本的版本价值作一介绍，供学界同仁参考。

一

现存的敦煌遗书《文心雕龙》残卷，系于1899年（清光绪二十五年）在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288石窟被发现的，1907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被匈牙利人斯坦因盗去，今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，原编目S5478；基尔斯（Giles）新编列为七二八三号。

大英博物馆对此卷有如下说明：“《文心雕龙》，内容为对文学流派的评述。梁朝（第六世纪）刘勰著。全书五十篇，现存第一篇（仅有末段）至第十五篇（仅有首段）。系用整齐的行书字体缮写在光滑的革纸上的抄本，封面部分破损，长十七公分，宽

十二公分，二二一一册。”^① 原本蝴蝶装册页，共二十二叶，四界，乌丝栏，每半叶十行或十一行，每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。起《原道》第一“赞”的第五句“体”字，迄《谐谑》第十四篇题。计存：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、《辨骚》、《明诗》、《乐府》、《诠赋》、《颂赞》、《祝盟》、《铭箴》、《诔碑》、《哀吊》、《杂文》十三整篇，《原道》“赞”末十三字，《谐谑》篇题五字。《明诗》第六前题“卷第二”，《铭箴》第十一前题“卷第三”，五篇合为一卷，可知此本为十卷本，正合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。在“卷第三”、“《铭箴》第十一”篇题下以及栏外，塗鸦“大宝积经”、“大宝积经第一”、“佛”、“言”等二十余字，表明此卷曾为佛教徒收藏，并以之献于佛寺。第一叶背面《征圣》第二第十七行栏下注“好”字，第四叶背面《正纬》第四第十三行天头注“东序”二字，第十三叶正面《颂赞》第九第十三行天头注“浅”字，第十七叶背面《诔碑》第十二第十六行天头注“烈”字，皆是过读者笺注该行“辞尚体要，不唯好异”，“昔康王《河图》陈列东序”、“虽深浅不同，详略各异”、“周史歌文，上闳后稷之烈”等句中“好”、“东序”、“浅”、“烈”等书写难识之字。在第五叶正面《辨骚》第五第三行至第七行栏下注：“皦，靖也”；“缁，黑色”；“涅，水中黑”；盖读者偶释正文“皦然涅而不缁”之义，这大概可算是今存最早的注释了。全卷“渊”作“𡵓”，“世”作“𡵓”，“民”作“𡵓”，皆避唐高祖、太宗讳。卷中亦多简字和同音假借字。

关于此敦煌残卷书写时间，学术界说法不一。今察此卷“渊”、“世”、“民”皆缺避或改避，而“忠”（唐高宗太子讳）、“弘”（高宗太子讳）、“照”（武后讳）、“显”（中宗讳）、“隆”（玄宗讳）、“豫”（代宗讳）均不避。《颂赞》第九有“仲治流别”，此卷“治”写作“冶”。杨明照校云：“‘冶’乃

‘治’之误。”^②“治”为高宗讳，作“冶”亦不属缺避。由此可见：此卷书写时间至迟不会晚于开、天之世，也有很大可能出自初唐人手。

此敦煌残卷乃迄今可见的最早的《文心雕龙》版本，因其近古，学术价值很大。自1926年日本铃木虎雄《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》

（载《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》）和国内赵万里《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》（载《清华学报》三卷一期）以及孙蜀丞校记（见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引录）等出，逐渐引起国人重视。如赵万里认为：“据以迻校嘉靖本，其胜处殆不可胜数，又与《太平御览》所引及黄本所改辄合；而黄本妄订臆改之处，亦得据以取正。彦和一书，传诵于人世者殆遍，然未有如此卷之完胜者也。”户田浩晓称此本“是现存《文心雕龙》中最古老的贵重文献”，并且从“纠正形似之讹”、“纠正音近之误”、“纠正语序的错倒”、“补入脱文”、“删去衍文”以及“订正记事内容”等六个方面，具体肯定了此卷在“校定《文心雕龙》原文方面所具有的资料价值。”^③

此卷约存全书26%强，诸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可据以校正以后传本文字之误者达470字以上。其中不少长期文意晦涩难解者，乃因此卷之出得以冰释。例如《辨骚》篇：传本“至于托云龙说迂怪，丰隆求宓妃，鸩鸟媒娥女，诡异之辞也。”而敦煌本在“丰隆”上有“驾”字；在“鸩鸟”上有“凭”字。诸家一致认为当据敦煌本予以订正。这样不仅使后二句与上“托云龙说迂怪”句一律，而且更合屈原《离骚》：“吾令丰隆乘云兮，求宓妃之所在。”“望瑶台之偃蹇兮，见有娥之佚女。吾令鸩为媒兮，鸩告余以不好。”有了“驾”、“凭”两字，这两句的文意方明。又如《哀吊》篇：敦煌本“胡阮之《吊夷齐》，褒而无间。”而后之传本“间”并作“闻”，或“文”，文意晦涩不可解。敦煌本出，诸家皆以为是，认为当据之校正。潘重规云：

“胡广阮瑀王粲均有《吊夷齐》文，胡阮则褒嘉无间然之辞，仲宣则讥诃有伤之之意。宜从唐写本作无间，文义方贯。”④户田浩晓认为：“敦煌本作‘无间’是正确的。‘无间’即‘无间然’之意，本《论语·泰伯》篇‘禹吾无间然矣’……多年的疑问遂一旦冰释。”⑤类似事例还多，于此足证此卷之可贵。

当然，敦煌本作为抄本亦不免有讹舛衍脱，例如《颂赞》篇“武仲之美显宗”，“武仲”即误倒作“仲武”；《辨骚》篇“故其陈尧舜之耿介，称禹汤之祇敬，典诰之体也；讥桀纣之猖披，伤羿浇之颠陨，规讽之旨也。”敦煌本竟脱“称禹汤之祇敬”以下二十一字；《铭箴》篇“盖臧武仲之论铭也，曰：天子令德，诸侯计功，大夫称伐。”敦煌本也脱“武”及“铭也”下三句十三字。加之抄写者用的是行书体，并且囿于当时的抄书习俗，多用简字、同音假借字（这种习俗可见于现存敦煌遗书其他写本中），也给后人辨析字义带来一些麻烦。

二

《文心雕龙》在有宋一代无论从公私著录、证引袭用、学人品评等诸方面考察，其流传范围比起隋唐更为扩大，可惜宋槧已无存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有“辛处信《文心雕龙注》十卷”，其书也不传已久。而征引数量较大的有北宋李昉的《太平御览》和南宋的王应麟《玉海》，可是后者宋刻也久已亡佚，未足直接为凭；而前者宋槧尚存，可供窥探一斑。《太平御览》是巨型类书，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（984），今传有日本存宋庆元五年（1199）蜀刻残本，正文九百四十五卷，目录十五卷；宋闽刻本三百五十一卷、日本安政二年（1855）仿宋刻活字本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以日本蜀刻本为主，补以闽刻本影印出版。

《太平御览》采摭的《文心雕龙》有《原道》、《宗经》、

《明诗》、《诠赋》、《颂赞》、《铭箴》、《诔碑》、《哀吊》、《杂文》、《史传》、《论说》、《诏策》、《檄移》、《章表》、《奏启》、《议对》、《书记》、《神思》、《风骨》、《定势》、《事类》、《指瑕》、《附会》等二十三篇的大部或部分，共计四十三则，九千八百六十八字，所涉篇章占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五十五篇的46%，总字数约占全书三万七千余字的百分之27%，比敦煌残卷还多一千余字。其中《明诗》、《诠赋》、《颂赞》、《铭箴》、《诔碑》、《哀吊》、《史传》、《诏策》、《檄移》、《章表》、《奏启》等十一篇几近全篇；《原道》、《杂文》、《论说》、《议对》、《书记》等篇也征引了大部分。因此，把宋槧《太平御览》征引的《文心雕龙》文字加以辑录，不啻为今传之宋刻《文心雕龙》残卷，多少可以弥补《文心雕龙》版本流变过程中有宋一代的空白。

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文心雕龙》因其仅次敦煌本而比较近古，并且是刊印本，因而其校勘的价值，历来为学术界所肯定。虽然在明清诸版本中，直接称引者较少见，但近人赵万里、孙蜀丞等则多所引录对校，影响遂大。开明书店编辑部1936年《校记》指出：“尤足珍者，如《哀吊》篇‘汝阳王亡’，注（按：指黄叔琳注，下同。）谓：‘汝阳王不知何帝子’，今此本（按：指《太平御览》，下同。）‘王’作‘主’，则是崔缓作哀辞者，乃公主，非帝子。《史传》篇‘左史记事者，右史记言者’，注谓‘彦和用《玉藻》说。此本作‘左史记言，右史书事’，则用《汉志》说。《论说》篇‘仰其经目’，注谓‘疑当作抑其经目’，此本果作‘抑’……⑥

宋本《太平御览》以其与敦煌唐写本较近，不少文字可以互为印证，阐发《文心雕龙》之原义。例如《宗经》篇“礼以立体”，“以”，元至正本、冯舒本、汪一元本、余海本，并作“季”；元本、传校元本、张之象本、两京遗编本、何允中本、日本活字本、王惟俭训故本、梅庆生音注本、凌云本、梅六次本。陈琬藏

钞本、钟惺本、梁本、日本刊本、王谟汉魏丛书本，张松孙本并作“记”；而敦煌写本和宋本《太平御览》同作“以”。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云：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‘《礼》以明体’。《法言寡见》‘说体者莫辩乎《礼》’，立体犹言明礼。”詹锳《文心雕龙义证》指出：“作‘以’为是。”又如《明诗》“张左潘陆”，元至正本、黄叔琳辑注本等并作“张潘左陆”，而宋本《太平御览》引则与唐写本合。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云：“按《诠赋》、《时序》、《才略》三篇所叙两晋作者，皆左先于潘，此亦应尔。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‘潘陆特秀’，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‘潘陆齐名，机岳之文永异’《梁书·文学·上庾肩吾传》‘太子与湘东王书……近则潘陆颜谢’，《诗品》上‘景阳潘陆，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’。亦并以潘陆连称。”于此可见敦煌唐写本和宋本《太平御览》引，可能更近于原貌。

三

元至正本是目前藏的最早的一部《文心雕龙》刻本，元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刊于嘉兴郡学。此本框高232厘米，宽156厘米，乌丝栏、蝴蝶装。卷前有“曲江钱惟善”作于“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未秋八月”的序，继有《文心雕龙目录》二叶。卷首另一行顶格题“文心雕龙卷第一”（后诸卷格式俱同）。次行下署：“梁通事舍人刘勰彦和述”（后诸卷均不署），卷末隔数行顶格作“文心雕龙卷第×”。中缝上鱼尾之上记字数，下鱼尾之下记刻工姓名。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五篇相接为一卷，分卷则另起，共十卷。“字体秀逸刚劲，犹存宋槧遗风。《隐秀》、《序志》篇有脱文，卷五阙第九叶。书中版面或有漫漶，当是雕版使用时间过久所造成”。⑦

关于此本的胜处，王元化曾指出：“通过杨著的校语（按：指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）雠校元至正本所得170多条校

语），可以看出元至正刻本有这样几个特点：一、在校出的异文中，有四分之三左右较底本（按：指养素堂本）为优。二、与唐写本残卷相比，在同样的篇幅内，元至正本的异文有一半与唐写本完全一致。三、弘治甲子吴门本、嘉靖庚子新安本、嘉靖癸卯新安本、万历己卯张之象本、万历壬午《两京遗编》本等，与元至正本出入甚少，由此可推出它们大抵属于同一版本系统。以上三点说明，此一刻本在校定《文心雕龙》原文方面所具有的资料价值，弥足珍重。”^⑧ 又有人指出：“以校勘而论，元本多与明本同，许多地方率先改正了唐写本之误。如唐本《征圣》篇：‘书契决断以象史’，元本作‘书契断决以象夬’，‘夬’与下文‘文章昭哲（皙）以象离’之‘离’字互为对文，都是《易》卦名；又《辨骚》篇：‘称汤武之祇敬’，明刻诸本同此，唐写本作‘禹汤’，元刻本作‘汤禹’，征之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，亦作‘汤禹’；唐写本此句下脱‘典诰之体也；讥桀纣之猖披；伤羿浇之颠陨，规讽之旨’等二十一字，元本则行文完整，足见其长处。较之明刻诸本，元本正而明本误者更不乏其数。”^⑨ 今以此本同敦煌唐写本、宋刻《太平御览》引文、清黄叔琳注本对校，得异文348条，其中同唐写本一致者105条，约占30%；同宋刻《太平御览》一致者80条，约占23%；同黄叔琳注本一致者154条，约占44%。此本“恒”亦缺末笔作“恒”，仍沿宋讳，但从其同敦煌唐写本、宋刻《太平御览》一致较之同后之黄叔琳注本一致为少、在异文中所占比例为低来看，此本虽本于宋，但已确经校改补正而比前详备了。但此本亦有两处重大脱漏：《隐秀》篇脱自“始正而末奇”，至“朔风动秋草”的“朔”字，计四百字；《序志》篇脱自“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”的“执”字，至“观澜而索源”的“而”字，计三百二十二字。他处错简者亦有。

关于元至正本与明清刻本之关系，从现存最早的明刻本，即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冯允中刊本《隐秀》篇和《序志》篇缺文和

元至正本相同，以及冯本都穆跋中有“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十卷，元至正间尝刻于嘉兴郡学，历岁既久，板亦漫灭。弘治甲子，监察御史郴阳冯公出按吴中，谓其有益于文章家，而世不多见，为重刻以传”的记载看，冯本乃直接出自元至正本。而冯本又是明清许多版本的祖本，如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汪一元私淑轩刊本、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余海刻本、万历七年（1579）张之象刻本以及崇禎己卯（1639）徐燊校本等，都同它有渊源关系。

综合上述，我们可以看到：敦煌唐写本、宋刻《太平御览》引、元至正本，不仅是今传唐、宋、元《文心雕龙》版本仅存的硕果，而且也是《文心雕龙》版本流变过程中的三个环节：敦煌写本近古，《太平御览》居中，元至正本则近于今传本，三者各具特点，所以在校勘文字和考察版本流变时，都具有弥足珍贵的特殊价值。

注：

①（日）户田浩晓：《作为校勘资料的〈文心雕龙〉敦煌本》，载《日本研究〈文心雕龙〉论文集》，齐鲁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。

②杨明照：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第76页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③⑤同注①引，第115、120页。

④潘重规：《唐写〈文心雕龙〉残本合校》，新亚研究所1970年版第3、48页。

⑥载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745～746页。

⑦⑧王元化：至正本《文心雕龙·前言》，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之至正本《文心雕龙》。

⑨府乐：《雕龙此推第一乘》，载《古籍书讯》第19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权儒学）